

# 供给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 赵志耘

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足够的动力。

## 通过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解除“供给约束”

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总需求调整受到越来越多制约。外需增幅无法回至全球金融危机前；消费需求短期也难以大幅提升；投资需求受资源、环境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的约束，刺激空间也明显缩小。但是，如果跳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增长的分析框架，从供给方面着手，就能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就全部经济看，供给是需求的唯一可靠的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没有出售产品的收入，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购买商品的支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回顾近十几年来我国历次调控的结果可以发现，总需求调控之手频繁出击，事实上并没有熨平周期，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波动，而且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过往每一轮“强刺激”过后，都难免留下大批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债务。更进一步讲，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

短期来看，有效需求决定了经济增长，而从中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使生产要素供给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就能使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一些强势机构通过人为制造“供给短缺”，从中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价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于经济中的很多领域，这直接侵害了作为需求方的广大民众的利益，也不利于需求的释放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要通过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

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有三个。一是劳动力供应的扩张，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人口红利和城市化)；二是不断的资本积累(高储蓄)；三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当前，这些推动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要么逐渐衰退，要么遇到了新的瓶颈。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的变化使得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利率管制、分业监管等金融管制使得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渠道不畅；研发投入不足、研发效率不高制约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0%多一点，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供给抑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资本积累，逐步解除“供给抑制”，从而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此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提高生产率，使得经济增长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生产率不是万能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故事的全部。”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人均GDP可比价增长了17倍，同期GDP可比价增长了25倍，可见，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是相对上升，而是相对下降了。这说明，我国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为长期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结合方式的改进，而这三方面都要依靠创新才能实现。创新驱动不仅有助于在要素驱动的后期阻止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且还能成为经济增长集聚效能较高的投入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与需求政策相比，供给政策更符合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提

高、企业创新活力的增强和制度创新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人力资本是以先天的劳动力为基础，通过后天多种途径投资而形成的。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不但具有一般生产要素的作用，而且也具有促使其他生产要素提高效率的功能，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仍然以获取知识为中心，强调创新思维和实际动手能力的素质教育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导致人才的创新能力不强、创业意识与能力不足。此外，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存在收入、福利、激励手段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体制内的人才缺乏创新激励机制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体制外的人才缺乏创新资源而导致创新能力发挥不畅，体制内、外的人才双向流动存在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因此，我国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打破人才身份、所有制等限制，改革人才投资政策、教育制度、培训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探索多种人才流动形式，给人力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企业充满活力，市场充满良性竞争，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当前，企业创新活力不足是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最主要障碍。在现有的创新体系中，企业常常处于被动创新的配角地位，创新的主动性和创新空间受到较大压制，严重影响了创新能力的提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发展经济，在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最好的方式是顺其自然，靠市场发挥作用，最差的情形是政府跟市场争夺，说明当时人们就看到了政府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权的问题，并且认识到应该把这种权力交给市场，顺其自然。因此，要改变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力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严格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通过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制度创新是指对现存制度的变革，实质是一个社会以新的更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竞争制度等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的变革。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于设立新的规则，增加产出的积累；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产出增长率。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实现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贫困的泥潭不能自拔？什么是决定经济繁荣或贫困的历史力量？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争。政府干预的最终效果取决于经济的供给能力，这是因为虽然需求对供给有重大影响，但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各种有效需求都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其生产率，而生产率又取决于其供给能力。因此，与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需求政策相比，强调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保护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包括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的供给政策更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样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 为善何分大小

□ 张田勤

## 只有当小善也能被纪念和鼓励之时，才能积小善为大善。

一则关于器官捐赠的新闻最近引起广泛热议。一名21岁的大学生去世前，签署了遗体捐献书。最终，她的眼角膜给两位患者带去了光明。然而，时至今日，她的亲属们仍在为她的事情奔波；当初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曾承诺今年清明节会将她的名字刻在功德碑上，但现在功德碑上仍没有她的名字。对此，有关机构表示，眼角膜属于人体组织，不属于器官，所以器官捐献功德碑上不会刻捐献眼角膜大学生的名字。

从严格意义上看，人和生物体的构成由小到大是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条也明确规定，眼角膜属人体组织，并不属于人体器官，但是，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即奉献的文化解释来看，捐赠眼角膜都应得到铭记和感谢。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历经千百年，这一要义已成为一种核心价值，不仅在中国被传承，在其他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中也广泛存在着。所以，如果因为一种学术定义的差异就将捐赠组织的贡献抹杀掉，这有违文化文明的精神。

另一方面，从爱即奉献的文化解释看，一个人能把自己的东西，尤其是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文化传统下，无论是细胞(如骨髓细胞)、组织(如角膜)还是器官(如肝脏)捐赠出来，都是一种爱的奉献，捐献者的精神和情操都是一样的。正如一位只有10元钱的捐赠了10元，而一位亿万富翁捐赠了100万元一样，都是值得铭记和感谢的。

此外，由于器官和组织的学术解释在一般公众看来是没有差异的，所有捐献了组织和器官的人也应当获得纪念和缅怀，这才能促使人们从行小善过渡到行大善。中国人捐赠器官之所以很少，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捐赠器官这种意义并不亚于捐赠器官的所谓小善行得不到鼓励和铭记，也就不可能打动人们向前迈出更大的一步——捐赠器官。只有当小善也能被纪念和鼓励之时，才能积小善为大善，让捐赠器官的千里之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一点，在斯里兰卡的眼角膜捐赠中得到充分体现。

20世纪50年代末，斯里兰卡的医学博士席尔瓦在报纸上撰文《LIFE TO DEAD EYE》(意为“生命在逝去，眼眸可重生”)，呼吁国民开展眼角膜捐献活动。此后，越来越多的斯里兰卡人接受了捐献眼角膜的号召，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善行，是一种“布施”。在这种国民认知下，斯里兰卡的前总统都捐赠角膜，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斯里兰卡，其在无偿捐赠角膜志愿者书上签字的人数有百万人之巨。

斯里兰卡的捐赠角膜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并成为世界之最，一个重要原因是“布施”观念深入人心。布施是以慈悲心给予他人福祉与利益之事，但是，布施之后不只是给予他人，而且还有福，具体体现为能得到好报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眼角膜捐赠者的名字当然也应当出现在功德碑上，如此才能成为鼓励更多人捐赠组织和器官的重要力量源泉。

不只是深受佛教文化的斯里兰卡，在西方文化中，也有这样的鼓励小善的传统。以人们爱着的英国《唐顿庄园》为例。庄园中的厨娘帕特莫，其任子在一战战场上阵亡。官方认定他是临阵逃脱，因此没在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上刻上他的名字。但是帕特莫认为，他的任子上了战场就是为国捐躯，理应得到国家和公众的纪念。经过帕特莫的多番请求、善解人意的伯爵罗伯特的巧妙运作和捐款，为帕特莫的任子单独建了一个纪念碑，而且就在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旁边。这终于了却了帕特莫的心愿，而且给了唐顿庄园附近的村民甚至整个约克郡的公众一种鼓舞：所有为公众、国家和国家作出贡献的人都应得到铭记和缅怀，而不论其贡献大小，甚至是否被怀疑当了逃兵。因为，即便当了逃兵，只要其上过战场，就是为国家和公众作出过贡献，就值得纪念。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 齐鲁策论

### 展望“十三五”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紧接着，在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表述。供给侧改革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意味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有了重大转变。

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可以从需求端去寻找，也可以从供给端去寻找。但长期以来，我国由于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经济增长一出现问题就习惯性地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提振经济。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只具有短期效果，而且副作用和后遗症多。当这些副作用和后遗症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不但需求刺激的效果越来越弱，而且影响到经济的平稳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从供给端去寻找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就成为了必然选择。

## 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端“三驾马车”均显疲态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GDP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也是得益于三驾马车的有力拉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三驾马车同时出现动力不足。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地减速，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四年。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为6.9%，比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降低了5.2个百分点，降幅高达43%。经济这么长时间的大幅减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三驾马车总有一驾或两驾马车动力比较强劲，可以弥补其他马车出现问题而带来的动力不足问题。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呈现出疲乏的态势。

从出口来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中小出口企业尤为困难。此外，由于发达经济体实行“再工业化”战略，鼓励产业回归并且更加重视扩大出口，东盟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我国在国际市场面临的贸易保护和竞争压力都大大加大，订单向外转移的趋势明显。据海关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10.2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8%，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

从投资来看，受制造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减弱。短期内房地产市场难以走出低迷，制约了投资和相关行业增长。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政府“加杠杆”投资能力有限。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速下滑至10.3%，创2000年以来新低。

从消费来看，受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等因素影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低，消费需求萎靡不振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大约在65%~70%之间，而我国只有50%左右。居民收入偏低，再加上社保的不完善，必然导致消费潜力得不到释放，就无法



# “全民造句”时代的城市软实力建设

□ 张先亮

## 高素质的语言能力，有利于凸显城镇的个性，为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提升城镇市民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忠诚情感。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的重大战略，而新型城镇化的“新”字，就体现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升人的素质。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本身的状态和发展、语言使用的能力与态度等等，与人们的生活质量、世界观、人际关系等等都密切相关，因此，语言生活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必然会突显。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实现，离不开市民高素质的语言能力。

从必要性看，良好的市民语言能力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推手。首先，新型城镇化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源的基础，是劳动者其他各项能力得以提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良好的语言能力是高素质人才的基本要求，是人们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创新能力的基础，有助于高效工作、协同创造和人才流动；也有助于人际和谐。其次，人的语言能力越强，拥有的语言资源就越丰富，就越能对城镇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比如人们掌握了汉语普通话资源，就有利于当今主流文化的推广和普及；注重保持地方方言资源，不仅有利于当地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有利于博采各地文化的精华；具备一定的外语资源，有助于理解和吸纳外国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将其融入新型城镇的文化建设中。多元文化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建设“软实力”的体现，有利于凸显城镇

的个性，能为其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而这需要高素质的语言能力来保证。再次，语言还有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良好的语言能力对提升城镇市民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忠诚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市民在心理上认同了“我们的城市”，那么就会自觉自愿地为建设美好城市而克己能。

从可能性看，新型城镇化也为市民语言能力的提高提供了机遇。首先，新型城镇化对市民主动提升语言能力形成了倒逼机制。新型城镇是有序竞争的社会，也是群体化生存更趋理性的社会，市民要融入这样的社会并实现自我价值，需要主动寻求机会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其次，新媒介的广泛使用为市民提升语言能力创造了条件。再次，语言信息、语言教育信息的易得性和语言生活参与度的提高让市民提升语言能力更为高效。不同于古人需要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现在的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获得需要学习的语言样本，也非常容易获得语言教育的相关资讯和参与相关培训，更重要的是，“全民造句”的可能让人们有机会在实践中训练和检验自身语言能力。

然而，在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大量来源多样的人员聚集，随着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关系复杂化、信息传播媒介多元化的不断发展，语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日益突出，从而对市民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一，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言和多方言能力。在过去单言单语的生活中，人们只会方言，要么只会一种语言就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但在今天，多言多语已经成为新的生活状况。小农经济时代，各地说着各自的方言，普通话对人们来说发挥不了其应有的功能，因而人们也就没有



学习共同语的动力。所以，过去推广普通话很艰难，且效果不明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需要交际，就需要共同语作为桥梁。这样，普通话的普及就有了内在动力。其认同感在城镇化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意义上，说普通话不再是少数人的语言能力特长，而将演变为服务全体市民日常交流的一项基本能力。同时，新型城镇化还对非母语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地球村”是人们对当前全球化态势的形象概括，这一特点也在城镇化中得到体现，即城市不再仅是本国民众的聚集地，同样也是别国民众的聚集地。全球化趋势需要国民拥有多样的外语能力，而这不仅在一线城市越来越明显，在二三线城市也是如此。

其二，新媒介语言的应用能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特点是智能化、网络化和信息化，这对市民的语言能力同样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市民熟悉网络社会的信息运作方式和表现形式，能够高效、全面地获取并准确理解信息，能够从海量的信息库中搜索到需要的信息并有效甄别信息，能够以合乎新媒介要求的语言形式提供信息、表达思想和诉求。

其三，语言文明诚信能力。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居于核心地位，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规范，其影响所及，大至治理国家，小至个人言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必然是建设文明、诚信的社会，而语言的文明和诚信是其基础。要改善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消极现象，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弘扬当代主流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还必须从语言这个源头抓起，消除“假大空”一类的语言污染，摒弃低俗恶俗媚俗的语言渣滓，清除各种名不副实的语言腐败，这都需要市民具有语言文明诚信能力。

总之，新型城镇化与市民语言能力存在紧密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广阔的舞台，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基础和动力，并在其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实现离不开市民语言能力的提高，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大如何同步建设基本的语言能力，是国家的战略大计。因此，从政府层面看，要做好规划、管理和表率作用；从市民角度来看，则要树立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到提高自身语言能力的每个市民应尽的职责。市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普遍提高，必将促进城镇软实力的增强。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